

海洋文化研究模式初探

张德明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文章提出以人、海、船、岛四大基本构成要素, 试为海洋文化研究设定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这四大要素之间的不同关联和结合, 产生了不同的海洋文化模式, 进而形成了人与环境的互动、空间的生产与现代性的展开等不同的模式。借助这种研究模式, 可能会发现一些被主流遗忘和压抑的话语和文本, 释放一些无意识的社会能量, 进而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 塑造海洋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 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海洋文化; 四大要素; 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4)01-0001-06

什么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迄今为止, 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这一点自然不难理解。因为海洋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宽广, 如此包罗万象——从鱼类、藻类和海底生物, 到海滩、岛礁、洋流和气象, 直到造船、制网、祭拜妈祖和供奉海上观音……自然的和人为的, 物质的和精神的, 历史和现实的, 美学的和实用的全都交织在一起, 令人应接不暇; 而所有这些方面, 业已分别成为生物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或宗教学等专业学科的研究对象。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提出“海洋文化”这个概念呢?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为了回应当下现实的需要。国家既已将发展海洋事业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人文社科工作者也应该有一个超越传统学科专业分类的综合性视野。因此, 建构海洋文化的研究模式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此, 笔者不揣鄙陋, 斗胆提出自己的不成熟想法,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海洋文化的四大要素

首先, 我想借用古代西方哲学中四大元素(土、水、气、火)说, 提出海洋文化的四大要素说, 试为海洋文化研究设定一个问题意识和研究模式。这四大要素就是人、海、船、岛。^① 在

在我看来, 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文化的综合研究, 从这四大要素入手比较容易切中研究对象, 抓住问题之根本。因为这四大要素之间的不同关联和结合, 产生了不同的海洋文化类型, 而不同的海洋文化类型则形成了人与环境的互动、空间的生产与现代性的展开等不同的模式。

四大要素中最首要的要素是人。无疑, 任何文化研究中, 人都应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这个对象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 与自然、文化和历史紧密相关的。马克思说,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更完整地说, 还应该加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为了生存, 向自然索取, 结合成社会, 进而创造了文化和历史。不同的人群与不同的环境结合, 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早在19世纪, 黑格尔就在其《历史哲学》中将世界上的地理环境分为三类, 平原型、高山型和海洋型。人与这三种不同的自然环境相遇, 就形成了平原文化、高山文化和海洋文化。但黑格尔的模式现在看来有点粗放, 其实这三大文化类型只是主导类型,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亚类和混合类, 如高原—平原型、平原—海洋型, 或高山—平原—海洋型(中国和印度的地理环境就是如此), 等等, 与这些类型相对应, 则形成了不同的人种、

收稿日期: 2013-11-10

基金项目: 985工程浙江大学文科海洋交叉项目(188050+193415A01)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54-), 男, 浙江绍兴人,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文化。E-mail: zdzdm@163.com

族群、语言、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

其次是海这个要素。海使人恐惧,也令人向往,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1]92-93}有意思的是,在中文和西文中,海都是女性的或阴性的。《说文解字》对“海”的解释是“海,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每声”。古文字学中“每”与“母”相通,从更深刻的文化哲学意义上,可以认为“母”既表声也表义。生命来自海洋。海像母亲一样,具有伟大的包孕力和强大的生产力,蕴藏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无独有偶,在许多西方文字中,如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近代拉丁语系的文字中,海都是阴性的,前面要加阴性定冠词。阴性的海有待于阳刚的男性去征服、去冒险、去播散种子。世界海洋文化中有一个普遍的风俗,就是不许女性出海,说是女性出海不吉利,会带来厄运。女性只能待在家中,等待男人归来。就像《奥德赛》中的帕涅罗佩一样。出海是男人的事,对海洋民族来说,所谓的男子气概,就表现在对海的征服上。^②靠什么征服?由此进入第三个要素,船。

如果说人和海分别代表了海洋文化的主体和客体,那么,船就是介体。人对海的征服是凭借船这个介于自然与人工之间的中介来完成的。从原始的独木舟、木筏,到后来的木浆船、三桅船,再到近代的蒸汽机船,现代的远洋货轮、核潜艇、航空母舰等,都是人在生存和发展这两大动机的驱动下,向海索取,与海这个自然要素结合后的产物。船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当漂流或航行在海上时,它是一个既流动又固定,既封闭又开放,既确定又不确定的空间。借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船是一个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2]95}处在生与死、此与彼、陆地与海洋之间。一位西方学者说:“水手总是居住在定居社会的边缘”,“希腊人不知道该把他们算作活人还是死人。”^{[3]59}这在古代航海技术不发达、人类应付自然的能力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完全可以理解。但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放

心地说,人类凭借其所制造的大型舰艇,就完全能够征服海洋了。泰坦尼克号这个巨无霸的沉没说明,与海相比,人还是非常渺小的。在欧洲海洋帝国中,与船相关的一大文学主题是海难余生(castaway)和相关的荒岛叙事,从近代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到当代美国的真人秀“幸存者”(survival)形成了一个包括小说、电影、电视系列节目在内的文本—文化传统。

由此进入第四个要素——岛。海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岛屿,岛屿是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它将人与自然、大陆与海洋联结起来。离开了岛屿,海洋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的重要依据,因为人类在海上的活动,从造船、捕鱼,到冒险、旅游,基本上都是借助岛屿这个特殊的空间才得以完成的。人类的航海活动,以岛屿为起点,又以岛屿为归宿——不管是发现了新的岛屿,还是回归原先的岛屿。岛屿接纳海外归来的游子,又目送他前去开启新的航程。历史地来看,创造西方文明的几个重要民族,如古代的希腊、近代的英国,都是岛国民族。岛国民族由于生存环境的狭小和生活资源的匮乏,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商业意识和殖民意识。希腊在公元四到八世纪的大希腊时代,或泛希腊时代,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海。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柏拉图说:“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爱琴海就像一个“大水塘”,而散布在其周围的希腊各城邦犹如一群青蛙。近代以来,建立海上霸权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这些沿海国家,接着是英国。它用了六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转型,从一个偏于欧洲西北一隅的岛国,一度发展为一个横跨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世界帝国。据亨德利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1930年代的统计,当时大不列颠帝国的面积是其母国的150倍大,而且掌控着当时世界上1/6的人口。^{[4]4}与岛相关的一个文化传统,在西方是“乌托邦”的理想建构,在中国则是长生不老的仙境追寻。

将上述人、海、船、岛四大要素联接起来,就生成了一个海洋文化系统(见图1)。这四大要素之间的不同关联和结合,形成了人与环境的互动,产生了不同的海洋文化类型,进而为空间

的生产和现代性的展开奠定了基本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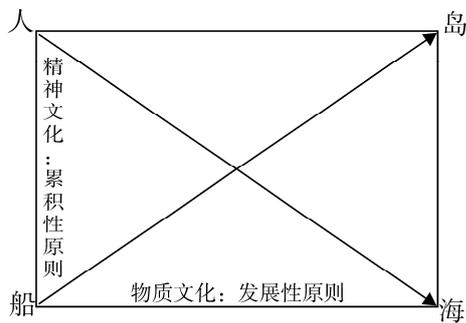


图1 海洋文化系统图

如图1所示，这个矩形系统由两条对角线和四条平行线组成。对角线指对立关系，平行线指相连关系。无疑，人与海是对立关系。人要征服海，迫使它向自己敞开，吐出自己的宝藏。借用雅可布森的叙事学模式^{[5]369-371}进一步分析，人一海这组关系中还包括了纵横两个向度，纵向属于人的、主体的、精神的方面，其所遵循的是累积性原则，积淀了人类生存的两大动机，欲望和畏惧，这两大动机是稳定的，不以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而改变的。出于生存欲望，人要向外扩张，向海索取；出于对海的畏惧，他要祭祀、祈祷，建立神庙，进而发明出一系列相关的习俗和信仰。而横向的则属于海的、客体的、物质的方面，其所遵循的是发展性原则，比如造船技术、定位技术、气象学、洋流学、制图学，等等，它们会随着人类认知能力和技术手段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

现在来考察平行线上的相连关系。如图1所示，人与船和岛之间形成相连关系，人向海洋的索取通过后两个要素才得以实现。人的矢量指向海，船的矢量指向岛。纵轴上精神文化的累积和横轴上物质技术的发展，最终都通过岛这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岛将四大要素集结起来，又播散出去。美国学者葛里格·德宁（Greg Denning）说，岛与其说是物理的，更不如说是文化的：它是一个文化的世界，一种精神的建构，只能通过一片海滩，一种划分了此与彼、我们与他们、好与坏、熟悉与陌生的世界的文化界线，才能接近。在越过海滩的时候，每个航海者都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并制造了某种新的东西。因此，海滩“既是开端也是终结”。德宁甚至认为，整个欧洲的扩张就是以岛屿和海滩为条件的，“欧洲人发现，

世界只是一片大洋，其所有的大陆全是岛屿。所有的部分通过海峡和航道相连。它们包围了这个世界”。^{[3]55}于是，岛屿就成为联结欧洲与美洲、地中海与大西洋、旧世界与新世界、主体与他者、殖民者与原住民的空间和场所。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原先作为征服对象的海洋逐步或部分转化为人类的审美对象，人类将岛屿开发成旅游资源，借助船只绕行海湾观赏海景。

我们的研究对象——海洋文化——就处在上述两条对角线和四条平行线汇合的中心地带，在累积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形成的张力中来回摆动，不断丰富、发展和演变。

二、四大要素结合的不同模式

在确定了海洋文化构成的基本模式后，现在我们要进入细节，描述一下上述四大要素结合后产生的不同的海洋文化模式，进而对东西方海洋文化模式作些粗浅的比较性考察。

先说西方。近代以来西方海洋文化大致形成了五种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补充的模式。这些模式之间的互动，促成了空间的转换和现代性的展开，从地中海时代进入大西洋时代，进而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太平洋时代，形成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的整体格局。

1. 殖民—探险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海、船、岛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张。人是殖民者，他出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捕鱼，而是为了发现新的未知的大陆或岛屿，使之最终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在人与海这个对角线上，作为主体的人是征服者，海是被征服者。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在船与岛这个对角线上，船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新的岛屿或陆地。而船本身也成了—个特殊的岛屿。福柯曾提到，殖民者开发美洲大陆时乘坐的海船像一个可以移动的“房子”漂浮在空间，海船所处的位置，是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它自给自足，自我封闭，但它同时航行在无边的大海中，把自己提供给无限，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条海岸到另一条海岸，直到殖民者上岸开拓他们新的家园。“于是”，福柯说：“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对我们的文明来说，海船从16世纪至今一直不仅是我们经济发展最伟大的工具，而且它也储存着最伟大的想象力。海船尤其是一种‘异托邦’，在没有海船的文明中，梦

是干涸的,密探取代了冒险,警察取代了海盗。”^{[6]762}

2. 海盗—劫掠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人既是水手,也是掠夺者,船只是在海上漂流,因为它的目标不是为了发现或征服新的岛屿,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为了劫掠过路的船只。船与岛之间的对角线没有矢量,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指向性。需要指出的是,殖民—探险模式与海盗—劫掠模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之间是互补互动的,除非后者干扰了前者,越过了底线,才会得到严厉的处置。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当时为了打破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女王默许甚至鼓励英国海盗横行在大西洋上,骚扰西班牙的船队。著名的1588年英吉利海峡之战,英国皇家海军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小巧的海盗船的介入。

3. 移民—难民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船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将移民运送到新发现的大陆或岛屿上。移民模式是殖民模式的必然结果,它与西方社会的乌托邦情结紧密相关。这种情结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孕育。柏拉图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提到,大西洋中有一个岛屿,名叫阿特兰蒂斯,那里的经济文化一度非常繁荣,但后来无缘无故地沉没了。于是,追寻这个传说中的岛屿,就成了西方海洋文化的一大情结。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精英阶层中形成了丰富的海外乌托邦想象,出现了三部以海洋为空间构架的文学、政治学、社会学著作。莫尔的《乌托邦》(Utopia, 1516)、培根的《新大西洋》(New Atlantis, 1626)和哈林顿的《大洋国》(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这三部作品对如何在海外构建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它们对英国国民空间想像的塑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英国的海外殖民/移民活动奠定了理论和文本的基础。

4. 奴隶—囚犯模式: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移民,与上述三种模式互补互动。为了解决殖民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欧洲殖民者将目标瞄准了非洲,开始将非洲黑人掠夺为奴,遣送到新发现的大陆和荒岛上。据历史学家估算,从1505到1865年,大约有1千万非洲黑人经“中间通道”被运抵美洲贩卖为奴。^③另一方面,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一个对人进行规训和惩罚的

过程,而那些无法被规训的边缘人,包括麻疯病人、精神病人、女巫、刑事犯等,即被送上难民船,遣送到新发现的遥远的荒岛去。以英国为例,18世纪后,大量由民间组织的海外殖民和投资公司进入北美、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地区。随着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原先的流放地无法正常运转了,于是库克船长发现的澳洲东南角被开发成了新的殖民地,用于安置刑事犯。1787年5月13日,亚瑟·菲力普(Arthur Phillip)船长指挥的“第一舰队”(First Fleet)扬帆起航,将778名刑事犯(其中192名女性、586名男性),送抵澳洲的植物湾(Botany Bay)。此后的80年中,英国共向澳大利亚输送了约16万名囚犯,使这里成为英国罪犯重要的监禁地,缓解了因现代化进程而引发的国内的人口压力和社会危机。

5. 传教—布道模式。这个模式部分与殖民模式和移民模式重合,其指向非常明确,即向遥远的“未开化”之地传播基督的福音。有些殖民者一身二任,本身就是传教士。而移民船上也有不少乘客是出于传教的目的登上甲板的。也有一些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传教会,自己组织专门的船队将传教士运送到某个大陆或海岛前去传播基督的福音。

以上人、海、船、岛结合的五种模式基本为近代西方海洋文化所特有,它们的活动打开了原先封闭的海洋空间,将现代化发展的成本转嫁到新发现的岛屿和原住民身上。进一步考察我们还发现,上述海洋文化模式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个人化。除奴隶和囚犯外,参与航海活动的人——主体,基本上都是出于近代西方崇尚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7]27}动机。二是文本化(textuality),也就是当代美国学者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在《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与文化嫁接》一书中提到的那种帝国式态度,即“将世界放到纸上”(put the world on paper)^④在海外殖民、移民、遣送过程中,事先有规划文本,事后有航海日志、商业报告,官方鼓励并要求水手记录下新发现的岛屿的气候、洋流、植被和当地的风土人情等,以便为进一步殖民统治和移民管理提供资料。不仅如此,甚至那些被遣送的刑事犯和海盗也写下了他们的或真实或虚构的海

上生活报告。所有这些，就构成了西方丰富多样的海洋文化和文学传统，即所谓的航海叙事（Story of the Voyage, or Sea-Narratives），并成为孕育近代小说的母体。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一下中国海洋文化中人、海、船、岛的互动模式。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以农业立国，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海外殖民和开发。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地貌多样，南方的蛮夷之地，西北的荒漠和东北的酷寒之地，足以容纳流放的官员和刑事犯。除了个别例外，历代中国的统治者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去海外寻找罪犯流放地的念头，更没有到虚无飘渺的海外去建立“乌托邦”的强烈冲动。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从皇帝到百姓对海洋的想像止于蓬莱仙境，而没有明确具体、可付诸实施的社会规划。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人与海的关系不是对立的、掠夺性的，而是互动的、和谐共处的。渔民在海上的作业像农民在土地上的耕作一样，顺应了季节和洋流，有节制、有保留地索取海上的宝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的海洋文化更像是古老的渔猎模式的扩展或延伸。所以，传统中国主流文化中，没有发达而成熟的殖民、移民和囚犯模式就毫不奇怪了。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似乎也不存在传教一布道模式。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从来没有强求别的民族接受自己文化，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平和的态度，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孔子只有在失意的时候才会想到要到海外去隐居（“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郑和下南洋可说是官方组织实施的最主动、积极地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壮举了。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开辟殖民地，而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也”（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属于夏志清（Fairbank）等学者提出的东亚“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8]的主体部分。进一步考察人、船这两个要素，郑和船队的主体，不是西方式“占有的个人主义”，而是典型东方式的由政府组织实施的“非占有的集体主义”（unpossesive collectivism）^[9]是以“义”而不是以“利”为出海动机的。^[8]从“文本化”方面看，

郑和及其手下的官员和水手也没有那种“将世界放到纸上”的“文本式态度”，航行之前和之后都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9]无法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文本传统和话语体系。

三、结语

以上笔者借助人、海、船、岛四大要素，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中西传统海洋文化模式作了粗略的描述和比较。从上述描述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相比与西方，传统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文学（此处用的是 literature 的原意，即文献）传统是相当薄弱的。但需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以上我们所说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并非全部的历史事实。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事实是要靠文本和叙事建构起来的。美国新历史主义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散乱、芜杂、琐碎的历史资料中，发现被主流历史学所压抑的边缘话语，进而释放出无意识的“社会能量”。^[9]根据笔者对英国航海文学和旅行文学的研究，英国的海洋文化传统并非天然就有，而主要是在近代由地理学家、航海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建构起来的，其中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 1552?-1616）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尽毕生之力，编辑出版了大型海洋文献集成《英国民族重大的航海、航行与发现》（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iges and Discoveis of the English Nation），建构了英国的航海探险史，塑造了英国的世界想像和空间意识，进而激发了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和对海外扩张的激情。^[7]如此一来，前文对中西海洋文化模式的比较分析就自然引出另一个问题，在中国海洋文化传统中，除了官方的朝贡体系和民间的渔猎模式，是否还存在着某种非主流的、边缘的海洋文化模式？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缺乏西方的某种模式时，这里指的是事实意义上的不存在（non-existence in factuality），还是文本意义上的不存在（non-existence in textuality）？比如，对近代中国海盗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展开，朱杰勤曾呼吁“希望有一部关于海盗的书出版，这对于我们研究阶级斗争史、中华关系史和华侨史都大有帮助”。^[10]^[6]笔者认为，这个空白与其说是资料不足造成的，不如说是传统价值观在起作用。欧洲民众视海盗祖先为家族荣耀，中国百姓避之唯

恐不及,更遑论为后世保存相关资料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以人、海、船、岛这个矩形模式来考察中国传统海洋文化,可能会发现一些被主流意识形态压抑和遗忘的话语/文本,^⑧ 释放出一些隐匿在历史幽暗处的“社会能量”,进而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理论,塑造海洋时代的中国国家形象,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 ① 岛属土,海属水,船帆属气,人的灵属火。
 ② 当然,这个风俗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加以批判,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甚至时至今日,女性出海也是非常罕见的。
 ③ “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或“中途”指的是奴隶贸易船从欧洲、非洲到美洲再回到欧洲的“黑三角”航行中从非洲西海岸横渡大西洋的那段旅程。在后来的加勒比文学中,“中间通道”成为一种隐喻黑人悲惨命运的象征。See *The Penguin Book of Caribbean Verse in English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Paula Burnett*, 1986, p. xlvi, p. 396.
 ④ See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⑤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论及郑和下南洋时说,郑和的船队“内有家属专用之船舱及公用厅房,随行家属包括妇女及孩童。虽有商人夹杂其间,他们并非个人出资经商。海船的往返,找不到一种不可缺少的商品作大规模的载运,因之其劳师动众,更为人指摘。”
 ⑥ 目前所知郑和下南洋的文本主要是留存于福建长乐之

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以及随行的马欢写下的《瀛海胜览》等少量文本。

- ⑦ 见笔者《旅行文献集成与空间身份建构》一文,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⑧ 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资料积累和文本建构,如浙江海洋学院柳和勇教授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资料和研究丛书》(包括中国古代海洋诗歌、散文、小说等卷),中国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2]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柳博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 DAUNTON M, HALPERN R. Empire and others: British encounters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1600-1850[M]. London: UCL Press limited, 1999.
 [4] 房龙. 房龙地理:关于世界的故事[M]. 纪何,滕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 SELDEN R.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M].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8.
 [6] FOUCAULT M. Ditsset ecrits 1954-1988[M]. Gallimard, 1994.
 [7]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7.
 [8] FAIRBANK J K, TENG S Y. On the Chang tributary system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6(2): 135-246.
 [9] GREENBLATT S.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1988.
 [10] 朱杰勤. 东南亚华侨史[M].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On Research Model of Maritime Culture

ZHANG De-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et up the problematic consciousness and propose research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ritime culture based on the four key elements of people, ocean, ships and islands. It is the varied relations and combinations between the above four elements that yield different models of maritime culture, and thus form various patterns such as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expansion of modernity. With the above research models, discourses and texts forgotten and suppressed by the mainstream might be found and unconscious social energies be released, which would eventually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culture theory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elp to shape Chinese national image at the marine time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our nation.

Keywords: maritime culture; four elements; cultural pattern

(责任编辑 张文鸯)